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昆体良教育论著选

[古罗马] 昆体良 著

任钟印

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昆体良教育论著选

[古罗马] 昆体良 著

任钟印 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昆体良教育论著选

[古罗马] 昆体良 著

任钟印 选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责任编辑 韩书玉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平装本	ISBN 7-107-10384-9/G·1475	定 价 4.70元
精装本	ISBN 7-107-10385-7/G·1476	定 价 6.8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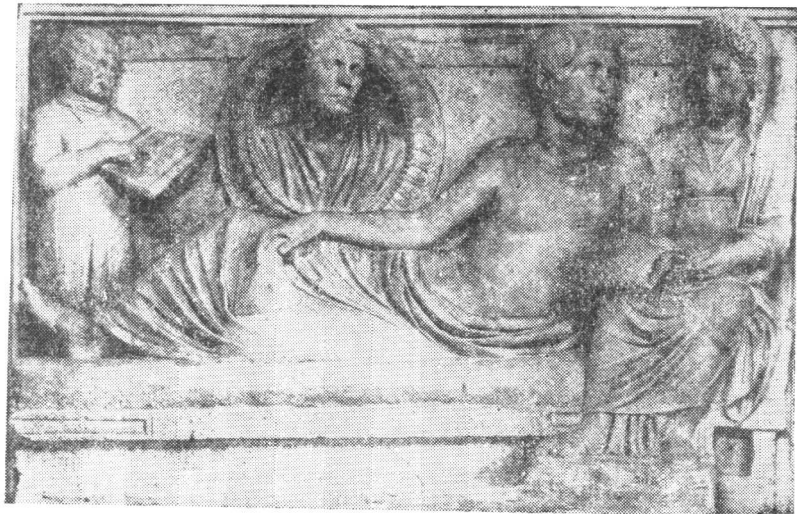
昆体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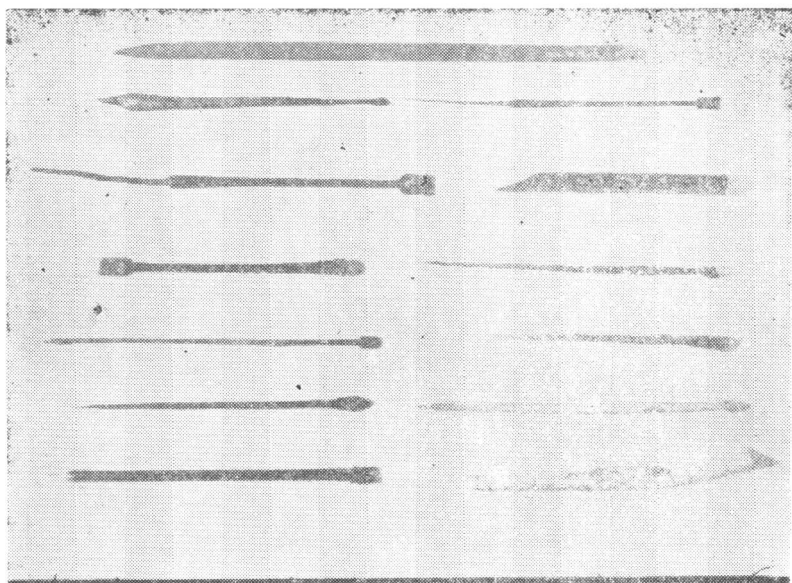
从尼禄（罗马皇帝，在位时间公元54—68年）时期到图拉真（罗马皇帝，在位时间公元98—117年）时期活跃于罗马的希腊语语法教师埃帕弗罗迪（Epaphroditus）。他将自己的全部钱财用于搜购图书，死后留下一座大型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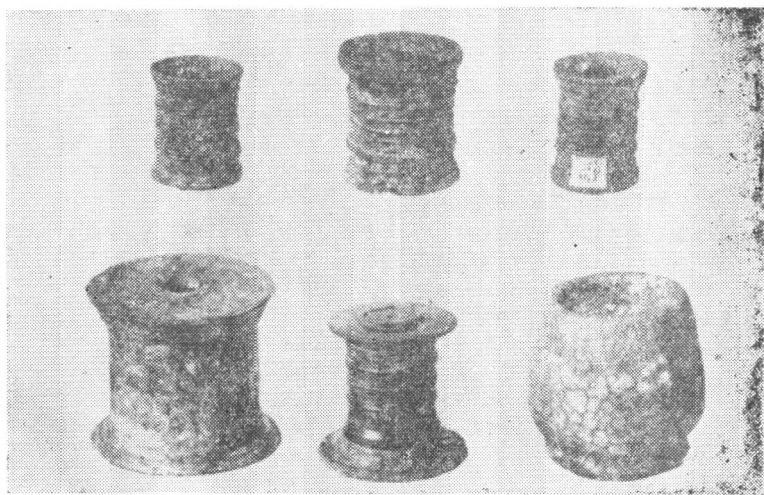
古罗马广场上一所学校的情景，一个学生正在受鞭答。



弗拉维王朝时代（昆体良活动的年代）的罗马石棺，图中表示一个奴隶用算盘为主人计算遗产。



古代罗马用的铁笔和羽毛笔



古代罗马用的墨水瓶

6048.6

“你（昆体良）所完成的不是一把刀子的职责，而是一块磨刀石的职责，你在培养雄辩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较之培养他在法庭上取胜更加伟大。我承认，你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你的最伟大的卓越之处是你给伟大人物以基础训练和塑造伟大人物的能力。”

——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h)

“我喜爱昆体良更甚于几乎所有其他教育权威，因为他既是教师，也是模范的雄辩家，即是说，他是以理论和实践的最巧妙的结合进行教育的。”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他（昆体良）的著作是整个文化教育领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书。我终身服膺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都可以溯源于少年时代阅读昆体良的著作。”

——弥尔 (John Stuart Mill)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无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译 序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是公元一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在整个罗马时代的所有著作中，只有昆体良的十二卷巨著《雄辩术原理》系统地论述了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其它著作中的教育言论都是零星的。昆体良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之集大成者，是夸美纽斯以前西方最杰出的教学法学者。文艺复兴时期，久已失传的昆体良的著作一旦被从积尘中重新发现，立即异彩夺目，使厌倦了经院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为之倾倒。昆体良的许多教育见解和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富有教益。

—

为了理解昆体良及其著作，必须先对什么是雄辩术、雄辩家、雄辩术学校作简单说明。

雄辩术亦译演说术。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第三卷中曾追溯它的源流，他认为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政治家恩培多克里(Empedocles)是雄辩术最早的开山者。但是，昆体良也提到了荷马的记载，因为在荷马时代就出现了雄辩术和教授雄辩术的人。古代希腊是雄辩术繁花似锦的时代。经济的发展、文化与学术的高涨、政治生活的活跃，使希腊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彩绚丽、热情奔放的著名雄辩家。从希腊到罗马，雄辩术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内容的变化。希腊时代的雄辩术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致颂词，颂扬某个人或某些人

的功德和业绩，如在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二是就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或借以影响公众舆论，阐明自己的主张；三是法庭上诉案件的控告与辩护。第一个内容并不是大量的，它也只是希腊流行的习惯，不是罗马的固有传统。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直到罗马共和制时代仍然是雄辩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家格拉古兄弟以及西塞罗都是佼佼者。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皇帝独揽大权于一身，皇帝的旨意就是法律和公理，元老院成了有名无实的装饰品，政治生活窒息了，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已不可能。在昆体良的时代，雄辩术原有的第二个内容已经消亡，留给雄辩术的只有一块狭小的地盘——法庭。雄辩术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中虽然也还提到前面两个内容，但那只是理论上的虚悬一格，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现实任务。昆体良用了最大量的篇幅论述法庭辩论问题，甚至举例也多是有关诉讼事务的。这时，Orator这个名称已失去了原有的演说家的含义，只剩下了雄辩家、雄辩师或律师的含义。

其次是雄辩家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无论古代希腊还是罗马共和制时代，最著名的雄辩家都是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将领或学者，而不是以雄辩术为职业的人。例如，狄摩西尼斯是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者，他以发表著名的反对马其顿的演说而居于雄辩家的首位。伯里克利斯在雅典执政40年之久，其间使雅典达到繁荣的顶峰，他也是著名的雄辩家。伊苏格拉底是学者，他写作了著名的演说词，但本人并不长于演说。格拉古兄弟、西塞罗都是活跃的政治家。西塞罗虽也承办过诉讼事务，但不是以此为职业。到罗马帝国时代，政治家只是奉旨照办的官吏，没有发表演说的必要和可能。哲学家和雄辩家之间的齟齬日益加深，雄辩术的任务已退缩到限于诉讼案件，于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师、律

师，成了一种职业。上流社会的青年以这种职业作为进入政界的跳石，下层社会的人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作为取得稳定而可观的生活来源的门径。所以，到罗马帝国时代，雄辩术衰落了，但雄辩术学校却受到了欢迎。这是一幕历史悲喜剧。

罗马帝国时代的学校大体有三个梯级。初等学校是私人开办的收费学校，教师大多是为糊口而从教的被释奴隶，初等学校教师地位卑贱、待遇菲薄，罗马的自由民以担任初等学校的教师为羞耻，不屑为之。此外，还有少数大奴隶主为了提高奴隶的售价^①，也专为青少年奴隶开设初等学校，教以读书、识字和某些职业技术（会计、簿记、抄写、采购、管家等），教师由奴隶或被释奴隶担任，有的奴隶主也亲自担任教学工作。第二梯级的学校是文法学校，学习的内容是文法和读诗，大致相当于我国学校中语文课的一部分内容。昆体良曾说，希腊字Grammatica译成拉丁文是Literatura，所以，称这种学校为语文学校，更能名实相符。帝国时代的高等学校是雄辩术学校。

在我国现行教科书中，罗马帝国时代的雄辩术学校被称为修词学校，这个名称显然与实际不符。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这种学校不是修词学校而是雄辩术学校。从培养目标看，这种学校是以培养能承办诉讼案件的辩护师即律师为宗旨的，而不是培养一般的演说家，更不是培养修词学家。从学习内容看，它远远超出修词学的范围。昆体良也和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必须有宽广深厚的基础知识，要学习天文、数学、几何、音乐、哲学、伦理、逻辑、法律等当时几乎所有的学问，此外还要讲究说话

①识字的奴隶每名的售价可高达七十万塞斯特斯。昆体良一年的薪俸只有十万塞斯特斯，而昆体良的待遇之优厚，据朱文那尔说，在罗马雄辩术教师中是比白乌鸦更为罕见的。

的声调、节奏、抑扬顿挫、面部表情、手势、仪态、风度，甚至要向演员学习，这些都与修词学不相干。从教学方法看，起主导作用的是学生的演讲练习（declamation），学生在熟读名人的演说词的基础上，自己写作演讲稿，据以在班上作演讲和辩论，由教师评定其优劣，并结合这种活动传授辩论的理论和经验。虚拟的诉讼案件的辩论占有重要地位。从词源上看，昆体良曾说，希腊字Rhetorica译成拉丁文是Oratoria或oratoritrix，他对这种译法并不感到满意，但是他说，既然西塞罗已经用这个字作为自己的著作的名称，他也只好接受这种翻译。我们知道，西塞罗的名著De Oratore只能译作《论雄辩家》，而不能译作《论修词学家》，该书的内容可以充分证明。当然，讲究修词也是雄辩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条件，但雄辩术的范围比修词学宽广得多，内容丰富得多。

在希腊的高等学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学校。到罗马时代，雄辩术学校取代了哲学学校的地位。发生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哲学家的地位的低落。希腊哲学家高谈玄奥的天理性命而不谙实事，只是一些徒尚清淡的迂阔之徒，与讲究实际、注重行动的罗马传统不能相容。其次，有些来到罗马的希腊哲学家往往鼓其如簧之舌，站在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头头是道的狡辩，这种巧言佞色的表现使崇尚朴素、严峻、求实的罗马人感到厌恶，把他们看作不可信任的危险人物而予以驱逐，甚至杀害。第三，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特别是韦帕芗建立弗拉维王朝以后，皇帝急于要建立父传子、子传孙的帝位世袭制度，有些哲学家反对这一企图。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也导致哲学家被排斥、驱逐乃至被迫害。哲学家和哲学学校的凋落也为雄辩术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昆体良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二

大约公元 35 年（一说公元 40 年），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出生于西班牙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上。这时，西班牙已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和高等教育的中心，西班牙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哲学家。昆体良的父亲在罗马教授雄辩术，颇有名声。少年时代，昆体良在罗马的文法学校受教育，他的老师包括著名的文法教师里缪斯·帕利门。帕利门原是一名家生奴隶（奴隶主和家中的女奴隶所生的孩子），他在以奴隶身份陪伴小主人上学的过程中，从旁偷偷地学会了识字读书，还学过纺织。在成为被释奴隶以后，他通过自学成了文法教师，他是标准的拉丁文文法教科书的作者，在罗马开设了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学生多达 200 人。帕利门一年的学费收入达 40 万塞斯特斯，是后来昆体良的年俸的四倍。此外，帕利门还兼营织布厂和葡萄园，有更大宗的收入，成为罗马的巨富。昆体良还为著名的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当过助手，曾倾听过正处于权势顶峰的辛尼加的演说。公元 58 或 59 年，阿弗尔去世，这正是旷世暴君尼禄皇帝统治的时期，昆体良离开罗马回到故乡西班牙，大概在那里操律师业务。

公元 68 年，尼禄自杀，元老院宣布当时驻节西班牙的将领、年逾古稀的伽尔巴继任皇帝。年底，伽尔巴回罗马时把昆体良带到了罗马。

昆体良再到罗马后，遇到一场争夺帝位的混战，半年之内，包括伽尔巴在内，三个皇帝先后被杀。69 年底，韦帕芟翦灭群雄，夺取宝座，建立了弗拉维王朝。

据塔西佗说，韦帕芟“是在做了皇帝之后变得好起来的唯一的一个皇帝。”韦帕芟在教育上作了一次重大革新，他在罗马历史

上第一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雄辩术学校，包括一所希腊语雄辩术学校，一所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的就是昆体良。昆体良大约在公元 70 年开始，在这个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 20 年，直到退休。

在担任教师的同时，昆体良还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以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昆体良在事业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不但成为罗马最负盛名的教师，而且拥有大宗地产，成为富人。

公元 90 年左右，昆体良从雄辩术讲座的公职岗位上退休，他应朋友们的一再请求，接受了撰写《雄辩术原理》的任务。他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十二卷的巨著（约合中文 65 万字）。本书没有即时出版，因为昆体良想在自己的创作热情冷静下来以后再作些修改。只是在朋友的催促下，才在公元 96 年出版。

昆体良生前确曾出版过的著作除《雄辩术原理》外，还有《论罗马雄辩术衰落的原因》和一篇法庭辩护词。此外，未经昆体良本人同意，他的学生还出版过他的一部分讲义和辩护词。讲义中的内容已包含在《雄辩术原理》中。留传到现在的只有《雄辩术原理》，其它以昆体良的名字出版的书都是伪造。

昆体良退休以后，在从事著述的同时，还担任多密善皇帝的两个侄外孙，即弗拉维·克里门斯的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由于克里门斯的影响力量，多密善皇帝给昆体良封赠了执政官称号。这是一个并无实权的空衔，只是名誉、地位和某些特权的象征。

已知的昆体良的学生有小普林尼。但是小普林尼并不赞成以雄辩术作为教育的唯一目的。

昆体良的荣誉、地位和财富都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点。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保证他的晚年幸福。他结婚很晚，当他退休时，他的十九岁的妻子去世，接着两个幼子又先后死去。相继丧妻和失子，使昆体良晚境寂寞凄凉。据说昆体良死于公元114年或118年，也有人说应早于公元100年。

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失传了，人们认为再也不可能得到这本著作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古籍搜藏家波齐奥·布拉秋利尼（1380—1459）于1416年在瑞士参加康斯坦斯宗教会议期间，在瑞士圣·高卢女修道院的藏书楼中偶尔发现了《雄辩术原理》，布拉秋利尼用三十二天时间以秀丽的手笔抄写了这部著作，使它得以重新流传于世。弗吉流斯（1349—1420）为《雄辩术原理》作了注释，使这部著作成为教育家们普遍阅读的书籍。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得到了人文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昆体良重返罗马以后的全部活动是与弗拉维王朝联系在一起的，他历经弗拉维王朝的三代皇帝，备受尊荣恩宠，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他不是辛尼加一类的阿谀逢迎之徒。昆体良谨言慎行，严于律己，忠于职守，埋头业务，似乎是一个不热心政治的人。韦帕芑皇帝保持了罗马崇尚简朴、反对奢侈放纵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昆体良也是如此。韦帕芑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极力排斥哲学家。在哲学家和雄辩家之间的学术之争、宗派之争和门户之争上，昆体良不像西塞罗那样持骑墙折衷态度，而是明显贬抑哲学家，为雄辩家争辩。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证明昆体良在迎合韦帕芑的胃口，而只能看作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但至少也说明了昆体良对韦帕芑没有危险。昆体良的晚年是在暴君多密善皇帝的统治之下，居然也尊荣显贵，又怎样解释呢？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第三卷中以委婉曲折的方式作为举例提

出了一个问题：“在暴君的统治下，我们是否应承担我国政府的工作？”这句话含义是什么，它与昆体良在尼禄时代离开罗马、尼禄死后又重返罗马的行动有无某种联系，不得而知。但是，尽管昆体良没有达到孟轲“诛暴君如诛独夫”的认识高度，在作恶多端的多密善身边提出这个问题，确是大胆之举。但是，这时昆体良已是风烛之年，他只能委曲求全，埋头于著述以终其生。若不是门格里斯以侄女婿的身份向多密善进劝，也许昆体良不可能得到那件装饰品——执政官空衔。从《雄辩术原理》中可以看出，昆体良品德高尚、自奉甚严、宽厚豁达、作风正派，潜心于事业而不孜孜于名利，讲究实际而不尚空谈。这是昆体良在罗马教育界赢得声誉的重要原因。

在雄辩术的学术上，昆体良择善而从，不囿于一宗一派；广征众说，而又自成一体；尊敬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通情达理，而又不随和流俗；博学多识，而又谨慎谦虚。在演说的实践上，昆体良也许在狄摩西尼斯和西塞罗之下，但在雄辩术的理论研究上，则是后来居上。

三

当罗马人接触希腊文化以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便成了罗马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纽带。进入帝国时期以后，这个问题仍然缠绕着许多有识之士的思想。阻止希腊文化的传播正如阻止罗马传统的消失一样困难。教育领域的情形也不例外。昆体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汲取希腊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同时又力图重振罗马文化的优良传统。他既不盲目排外，敝帚自珍；又不盲目崇拜希腊文化，数典忘祖。昆体良熟知希腊的各种著作，他甚至振振有词地主张儿童开始说话应先学希腊语，然后才学拉丁语。昆体良的教育理论中也广泛汲取了希腊人的见